



周恩来与
中国外交

米镇波 郝祥满 宋文峰 著

重庆出版社

深 谋 远 虑

——周恩来与中国外交

米镇波 郝祥满 宋文峰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98 年·重庆

责任编辑 周世慧
封面设计 王 多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米镇波 郝祥满 宋文峰 著

深谋远虑——周恩来与中国外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 4 字数 295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6-3887-6/K·205
定价:17.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周恩来主持新中国外交 26 年为主线，循其足迹，着重追述了周恩来对苏、对美、对日外交，同时本书也旁及周恩来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包括对非洲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向世人揭示，周恩来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推行和平睦邻外交，创造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以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而殚精竭虑的过程。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场面和高层次的外交斗争中，周恩来深谋远虑的外交形象及非凡的外交才华与伟人风采会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引用了最新发表的俄文档案和英文、日文相关成果。全书行文流畅，情节生动紧凑，集知识性、可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可供各个层次的读者阅读。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我社组织了一套《周恩来风采》丛书，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周恩来与中国外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等四个方面来展现周恩来在处理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折冲樽俎、巧解矛盾、深谋远虑、以民促官的伟人风采。这套丛书有如下特点：

①选材独特。当年中共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新中国外交、中日关系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周恩来用他那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毅力较好地处理好了这些关系，为党和国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几方面的内容也是关于周恩来生平事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努力。

②作者队伍强。作者是长期从事有关方面学习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他们多年心血的结晶。

③融史料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由于作者充分占有现有资料，在写作中力图真实再现当年的情景，使这套丛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娓娓道来，使该丛书有较强的可读性。

经过作者和编者的努力，这套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望朋友们能接纳它，同时，我们更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更

多的精品之作来，使有关周恩来的研究更加深入。

编者

1997年12月

前　　言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主持中国外交长达 26 年，给后来者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西方介绍周恩来开始，至今已有 60 来年，自周恩来逝世算，至今也已 20 年。在这一阶段，国内外对周恩来的研究都在逐步的深入，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领域情况大同小异。在这个领域，一开始就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纪念文章，这是为学术研究所做的不可缺少的铺垫或者说是研究的初步。1988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周恩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裴坚章先生的《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具有开拓意义。该文提出，“周恩来不仅有自己的外交思想，而且是全面、系统，富于创见，别具特色的。”“这一思想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点，而风格则完全是周恩来的。”这是一个全面、深刻而精辟的概括。这样一种概括，为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拓宽了视野。26 年来（1949—1976），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内容就是，为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新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为了新中国人民能专注于四个现代化的和平建设，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开展了对苏联的外交，对周边国家及亚非国家的外交，

对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在这丰富多采的外交实践中，产生了丰富多采的周恩来外交思想，外交原则，形成了他自己的外交风格。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就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写了以下几部分：

- (一)周恩来与对苏联外交；
- (二)周恩来与对美国外交；
- (三)周恩来与对日本外交；
- (四)周恩来与对东南亚地区国家外交；
- (五)周恩来与对中东非洲国家外交。

以上几部分基本上反映了周恩来建国后的外交实践，反映了他在新中国外交方面迈出的三大步，即对苏联外交，对亚非国家外交，对美对日外交。本书尤其在对苏、对美、对日外交方面，给予了浓墨重彩，这是合适的；次之，是在对东南亚地区国家外交。在这里，本书强调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这是个特色；最后，是对中东和非洲的外交。好在本书只是个尝试，专家和读者们会对本书之不足给予体谅的。但是，我们自己则不会抱此侥幸心理，还将继续努力。

本书具有严肃的学术性，言之有据；同时，力求增加可读性，希望大家能接受它。

1997年6月24日

目 录

第一章 周恩来与中国对苏联外交	(1)
一 1949年:对苏外交的序幕	(1)
二 以中国总理身份出访苏联	(15)
三 争取联合国合法席位与处理苏联专家问题	(26)
四 “八大”外交路线:周恩来继续推进中苏联盟关系	(34)
五 沉默与等待:尽力挽回局面	(40)
六 辞世前的努力: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	(45)
第二章 周恩来与中国对美国外交	(56)
一 欢迎延安观察组的战友们	(56)
二 别了,司徒雷登	(73)
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97)
四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26)
第三章 周恩来与中国对日本外交	(166)
一 从求学日本到抗击日本	(166)
二 两个“一边倒”和两国对立	(172)
三 周恩来对日外交策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183)
四 三国四方对峙	(212)
五 对日关系:双轨并行	(236)

六 山穷水尽	(253)
七 柳暗花明	(263)
第四章 周恩来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各国外交	(290)
一 妥善地处理华侨双重国籍的历史问题	(291)
二 和平友好往来，“互谅互让”妥善处理边界争端	(300)
三 平等对待小国，承诺不称霸	(305)
第五章 周恩来与中国对非洲中东国家的外交	(310)
一 参加万隆会议，广交亚非朋友	(310)
二 周恩来与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外交	(315)
三 周恩来与中国对中东地区国家的外交	(345)
结语：言犹未尽	(359)
主要参考文献	(365)
后记	(371)

第一章 周恩来与中国对苏联外交

一 1949年：对苏外交的序幕

1. 全国胜利前夕斯大林主动与毛泽东协调立场

1949年1月6—8日，中共中央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决议。决议强调，中共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周恩来也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处理长期分散转变为集中统一，准备成立中央政府而必须妥善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说明。自三大战役以来，作为毛泽东的战友与同志，毛、周两人过从甚密，关系十分融洽。这次会议的发言内容，暗示着周恩来将要总理政府之工作，这是毛泽东之意。事实证明，此时，周恩来享有毛泽东对他的最充分信任，军国大事必与相商无疑。邓颖超说过：“说句老实话，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就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①两位伟人面对锦

绣前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种良好的关系，对党的空前团结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全国胜利日益迫近，外交工作愈来愈重要。1月8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强调，中共方面“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样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中共方面加大外交努力的力度。在制定中共对外政策方面，周恩来的发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1月10日元旦刚过，毛泽东就收到了斯大林发来的重要电报寻求与中共协调立场，电文开头是这样的：

“毛泽东同志：

1月9日我们收到了南京政府的照会，建议苏联政府作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就停战与和平签约问题的中间人。同时，类似之照会也发给了美、英、法三国政府，该三国还没有答复，而苏联政府至今也还没有给予答复。”显然，这是一封意在协调立场的电报。电报介绍了苏联方面延缓对南京政府正式答复的外交策略，同时向中共建议：“如果人们征询您对调处和平的意见，我们认为，您最好这样答复：‘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在中国恢复和平，但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中共发动的，而是南京政府发动的，因而它应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国内战争的战犯不得参加谈判。中共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需要某一个外国中介人。中共尤其认为，那种把自己的武装力量与舰队投入到国内战争以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家根本无资格作为中间人……。’

斯大林的电报非常客气地说，如果中共及毛泽东本人不同意苏方之意见，“则请把您的意见告知。”电报结尾还谈到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问题。斯大林建议再拖延一段时间，他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访苏，会被敌人利用于诋毁中共，似乎中共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而是靠莫斯科扶持起来的，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是自 1948 年上半年起，毛泽东访苏要求被第三次延缓。应该说，斯大林的话不无道理，而苏方之延缓则完全是出于其外交全局之考虑及外交步骤之谨慎。回溯 3 个月前，1948 年 9 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活动安排更紧张了。以前，虽然也常开书记处会议，但次数毕竟不多。这时几乎天天都开会。每天晚上 8 时左右，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来，集体办公。^②斯大林的电文必然要拿出来在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翌日，斯大林再致电毛泽东，就和谈的外交策略及和谈的前景等问题作了补充阐述。电文署名菲利波夫，乃是为了保密斯大林使用的化名，自 1948 年甚至更早些时候，斯大林就是用这个化名与中共联络。随 11 日的电文一起，斯大林转来了南京政府建议和谈的照会原文全文，其页边上赫然注有：“南京政府认为这个建议不应当公布于世”字样。看来，苏联方面要下决心抛弃国民党政府了，他们已把南京政府的机密文件直接转给中共方面了。这个局面的到来是何其难！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坚定、沉着，扎实努力奋斗，依靠人民大众之力量将改写中国历史于全新的一页。从 1945 年到 1949 年仅仅 4 年的时间，中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个奇迹只有在中共之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然而，谁又能忘记 1945 年呢？那个时候，斯大林是居高临下，板起面孔对中共说话的。俱往矣！在收到斯大林的两份电文之后，中共中央决策机构进行了认真反复的研究讨论，于 1 月 13 日以毛泽

东的名义电复斯大林，电文署日期为1月12日，为了这封复电，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又是彻夜未眠。复电内容写满32开纸两整页（俄文），共有四方面的建议，涉及中国战场上的形势、联合政府人选、战犯问题、苏方应采取的立场及外交策略问题。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似应如是答复南京政府之和谈照会，即苏联政府过去一直愿意，现在也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是，以何种方式达此目的，则属中国人民的内政。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之原则，苏联政府认为，在中国国内战争的双方之间介入为中间人，是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的复电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她倾向于以全部之正义去拒绝国民党和谈骗局，因为“中国国内阶级力量之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已能渡过长江而直捣金陵。”“好像我们已无必要再采用迂回的政策手段。在现在的形势下，若再次使用这类迂回手段将有害而无益。”中共中央的电报以铿锵有力的语言，细致全面的分析表明了自己严正的立场，即兵临城下何顾忌之有！大兵渡江直捣南京老巢才是真理！所谓的和谈，不过是国民党伺机再起的手段。在这封电文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光明磊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说出了人民的声音，代表了历史的呼唤，他们正视自己立场与苏联立场之不同，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之动力，这是何等的充满朝气！1月14日又一封电报从莫斯科发来，署名仍然是菲利波夫，是直接发给毛泽东的。这封电文32开纸两页半（俄文），共谈了6个问题。其要点是，劝中共不要直接拒绝和平谈判，要利用和平的旗帜来争取中间势力。当时，在中国国内确实存在着第三势力，如张申府等，这批人的后面也是美国人在支持。如此看来，斯大林的意见要认真考虑。再一个要点是，假设国民党接受了全部和谈条件，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该电为中共作

了如后的规划：宪法议会中 3/5 的席位，政府中 2/3 的部长席位都应留给中共，其余的议席与部长位置在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之间分配，总理、三军总司令，总统（假如设置的话）均应留给中共……在这封电报的最后，斯大林表示，中共对苏方的建议可采纳，也可拒绝，主权在自己。“您完全可以相信，即使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也决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仍一如既往是您的朋友。”^③就是在 1 月 14 日的这封电报中，斯大林提出派人来中共驻地面谈的建议。电文是这样写的：“我们坚持推迟您来莫斯科的行期，是因为目前您必须留在国内。如果您同意，我们可尽快特派政治局成员到中国哈尔滨或您认为合适的其它地方，就您感兴趣的全部问题进行谈判。”斯大林迈出这一步，是对中共外交的重大进展。苏方意识到，书面往来的沟通阶段应该结束了，开辟新的接触渠道已迫在眉睫。苏方整个电文口气和缓，完全是一种友好建议，决不强加于人的态度，并且一再强调，将来苏方答复南京政府时，一定要本着中共所希望的去做。1 月 14 日毛泽东又有简短的电报致斯大林，谈到了中共已公布和谈的八项条件，美国方面的试探，国民党内部的混乱无序及中共与莫斯科之间设电台下一步工作安排等问题。至此，立场协调已近尾声，双方立场基本接近统一，即有条件地进行和谈，利用和平的旗帜来争取群众，由国民党来承担继续国内战争之责任。1 月 15 日斯大林又电致毛泽东，内云：“很明显，我们双方就南京政府和谈建议方面的观点已达成一致，况且中共已开始了‘和平’攻势，也就是说，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前夕，在前苏联在华外交官们共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及苏联政府就采取共同的外交行动方面进行了有效而成功的协调，这意味着，中苏两党摈弃前嫌重新接近，是新中国对苏外交开始的序幕。这次共同行动，对中苏双方都

有巨大好处，则是不言而喻的。就在 1 月 10 日—15 日这短短的一周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天津，活捉其司令官陈长捷。北平解放迫在旦夕。国民党大势已去，美、苏两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对中国革命局势及其未来前景施加影响。当时在天津，由苏联驻华外交机构首脑导演，苏联驻天津领事季托夫做了成功的尝试。1948 年夏秋之际，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礼节性拜访了傅作义并做长时间交谈。随后，他向季托夫介绍了傅作义女儿傅东的情况，在天津《大公报》工作，持进步观点等等。从此，傅东与季托夫的过从渐密，傅东常到苏联驻天津领事馆来，他们之间话题有时就是傅作义本人的情况及其态度。据说，1948 年底，傅东紧急约见季托夫，“她来到后显得十分不安，眼里含着泪水”，向季托夫介绍了她父亲绝望的状态。“在讨论了各种方案后”，傅东接受季托夫的建议返回北平去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东随军南下过江后又来到天津。她向季托夫介绍了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放北平的过程后，强调说，“她告诉父亲，自 1948 年秋便秘密地与苏联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保持联系，并告诉了他与副领事几次谈话的内容。……直至这时，她的父亲才有些放心，而后又思考了一阵子才同意与中共和平谈判。”傅东向季托夫表示谢忱之后，又代表傅作义表示愿意送季托夫一匹非常好的跑马外加一群好马。此后，傅东随二野到《云南日报》工作，季托夫奉调回国，赴驻美使馆供职。两人天各一方。1989 年在齐赫文斯基努力下，两人又恢复联系。傅东在致季托夫的信中诚恳地说，“四十年前的那一切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您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同时也有您对我个人的帮助，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所谓对我个人的帮助，当系指上述内情而言。在苏联于 1949 年初，

将对华(中共)外交变为其战略重点之后,其驻华外交机构便积极地进行活动,季托夫先生与傅东女士之交往便是一例。

而相应地,毛泽东、周恩来也把开展对苏外交作为战略重点,全力加以推动。

1949年元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雅·维辛斯基召见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向他转交了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要求调停与和谈照会之正式答复,即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因此,并不认为担任国共双方和平谈判调停人的角色为合适。果然,基本上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见作了答复。是月1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刚解放尚留在该处的外交官、外国商人、外国记者及外国银行家如何处理问题,做了原则规定,即不承认上述人员的外交地位,只当作普通外侨对待,各级政权不得与之有任何正式官方往来。中共中央采取的这一立场,立即得到斯大林的认同。1949年2月16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鉴于苏联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地方政权尚无正式外交与领事关系,苏联方面已命令上述领事馆人员停止其领事活动,并视其身份为普通侨民。从2月份起,周恩来便着手去实施斯大林与毛泽东协调之结果,即开展和平攻势,周恩来是对苏外交的擘划者和实施者。

2. 米高扬 1949年秘密访华

1995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刊物《远东问题》(通常用俄、英两种文字出版)第2期和第3期连载安·列多夫斯基的长文《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介绍当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秘密访问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一周的内幕。^④米高扬于1949年1月26日动身,从我国东北入境,在旅顺口搭机,趁着